产业智库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与进展

綦成双[1,2]，褚如辉[2]，陈添悦[2]，裘 欣[2]，薛清扬[2]

（1.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2. 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杭州 310007）

摘要：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破解高校成果转化“无组织”困境的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性回顾现有文献，构建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整合性研究框架。详细梳理演进脉络、研究内涵、理论逻辑和特征比较等，并从边界组织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其力量建构路径。对于丰富和完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理论体系，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技创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有组织科研；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0－0015－07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加快高校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是重要议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均提出了“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正在实现从追踪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科研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时，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可观。2024年，中国成为世界首个有效发明专利数突破400万件的国家。然而，中国科技成果丰富，但成果转化率较低的现实依然存在。2023年，中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6%，其中高校仅为6.8%。2024年高校仍不足8%。这一事实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数量与质量”二元对立的困局，绝大多数智力成果处于“沉睡”状态，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现象尚未被改变。

当下，未来产业布局成为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选择，鉴于未来产业具有高不确定性、高融合性、高复杂性等显著特征，更加需要建立一种创新要素整合机制。作为强化国家战略力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制度安排，新型举国体制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为重要手段，是适应当前发展形势、应对机遇挑战，以更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资源组织范式。其蕴含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底层逻辑，为破解当前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无组织等现实梗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引。在此背景下，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的前端，“有组织科研”作为国家层面战略在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中被正式提出[1]。这一战略强调改变高校传统自由探索的科研方式，通过有组织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整合，建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建构机制[2]，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主体的协同攻关科研范式，具备系统性、导向性和交叉性特征[3]。

然而，现有围绕着有组织科研的研究，大多聚焦高校科技成果的生产环节，缺乏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进行系统阐释。因而对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困境的作用有限。与此同时，在高校科技体制创新的进程中，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开展。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发挥国家大学科技园等转化平台在高校科技成果转

收稿日期：2025-12-10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0903200)

作者简介：綦成双(1995—)，女，山东烟台人，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通信作者褚如辉(1981—)，男，浙江台州人，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科技成果转化；陈添悦(1991—)，女，浙江台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成果转化；裘欣(1993—)，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科技成果转化；薛清扬(1999—)，女，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

化中的服务功能[4]，为衔接有组织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关键思考。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系统性梳理与回顾，基于“有组织”的理论逻辑，构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拓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的理论内涵与外延。本文梳理了从有组织科研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演进脉络、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逻辑，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与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比较研究。更进一步地，从边界组织视角切入，基于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实践视角，深入探讨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力量建构路径，对于丰富和完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理论体系，以及推动高校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 从有组织科研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1.1 有组织科研

中国高校的科研活动呈现“单兵作战”和“小、散、虚”等特征，科技创新资源协同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5]，亟待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集聚优质资源、解决重大科研攻关任务。有组织科研的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RogerL Geiger首先论证了高校在学科研究范式之外成立独立的有组织科研机构，对美国高校科研能力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回溯“有组织科研”理念在国内的发展脉络，2022年8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剖析了当前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在有组织体系化布局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提出“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2022年9月，《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提出“加强有组织科研”。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有组织科研是指科研组织者基于体系化的思维，将体系内的要素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整体布局和优化组合使之体系化的组织过程，也是将其所及范围内那些离散的要素“黏合”起来以发挥其高效协同、补位合作、集成提升的系统建立过程[2]。其核心特征在于：①目标驱动性，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从“自由选题”转向“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重大社会问题解决。②资源集成，通过政策引导、平台共建、团队协作等方式，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复杂问题。③组织创新，强调建制化、体系化科研管理，推动“单兵作战”向“大团队作战”转型。

围绕有组织科研，国内学者主要探讨国家创新体系中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高校科研范式革命[6]，着重阐释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内涵[7-8]、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1]、核心要素与有效模式[9]、面临困境与突破路径[5,7-8]，建构涵盖边界、主体、职能互动关系等的高校有组织科研整合性框架[10]。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国内外有组织科研案例展开探索性研究，例如，美国研究型大学、国家未来产业研究所[11-13]，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3]，日本研究型大学[14-15]，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16]，以及如李政道研究所[17]等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创新实践。

然而，现有围绕有组织科研的研究主要聚焦高校科技成果的生产环节，缺乏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进行系统阐释。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一系列实践难点，现有研究未能提供基于“有组织”逻辑的破解路径。因此，围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逐步从“有组织科研”的研究范畴中延伸出来，成为弥补转化研究空白、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的重要议题。

1.2 从有组织科研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探索

传统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选择难度高、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参与主体多元等特征，容易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创新创业成功率不高。在实践中，科技成果转化还普遍面临转化链条不畅、优质成果难以挖掘、各类资源配置分散、专业支撑力量不足等现实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作为国家“有组织科研”战略在成果转化环节的深化与延伸，“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理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摆脱上述困境的重要模式。这一理念旨在进一步推动高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助力科技创新从基础研究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理念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得以形成与发展。2023年，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提出以大学科技园为载体，加快推进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18]。这一理念逐步深化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有靶向科技企业孵化、有体系未来产业培育”三有体系，探索以全生命周期赋能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同年，“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被浙

江大学写入年度重点工作。结合新时期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要求,多所研究型大学陆续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更好地发挥高校作用。例如,北京大学通过健全机制体制,建设完善具有北大特色的高质量有组织成果转化体系;中南大学以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为突破口,打造“现金+股权”“高校+平台”的有组织成果转化模式;西南交通大学实施“6326”科创工程,有组织推动校内科研项目的“就地研发、转化与产业化”。

1.3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内涵

回顾现有文献,学者已经围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陆续展开研究。例如,童嘉等[19]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校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构建了“主动式布局-导向型研发-场景式应用-成体系对接-产业化落地”“五位一体”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姚卫浩[20]以北京大学为例,阐述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有组织转化的积极实践。黄思维等[3]基于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案例分析,从制度建设和要素投入方面剖析了研究型大学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其中,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提出建立概念验证制度、技术许可/转让制度、学术创业支持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在要素投入体系建设方面,提出加强工程师队伍、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和产学研合作场景供给。陈刚[4]主张通过覆盖高校、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种创新主体的生态构建提升高校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整合学者的观点,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以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系统规划、资源调配和机制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进行甄别、评估和筛选,开发适宜培育转化的项目,最终转化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实现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进而催生新产业或提升现有产业竞争力。

2 对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解读

2.1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基础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并非单一主体或单一环节的运作,而是“高校-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全链条的协同过程。学界提出的三螺旋理论和有组织创新理论,为本文深入解读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运行的底层逻辑提供核心支撑。首先,Leydesdorff[21]提出三螺旋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大学、政府、产业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螺旋上升”的动态关系,打破传统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形成协同创新的系统合力。这一理论主张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源头,更需要通过与政府、产业等的循环互动,将实验室中的创新思想、技术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明确高校“知识与技术供给主体”功能、政府“制度与资源保障主体”功能,以及产业“需求与产业化主体”功能。这一理论直接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要素”奠定了基础。此外,Curral[22]基于科技创新及应用实践,开创性地提出有组织创新理论,其核心是通过“系统性方法框架”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经济与社会效益。这一理论对“无组织创新”与“有组织创新”进行内涵界定,并从目标导向、资源配置以及流程管理等维度进行概念比较,直接为深化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表1)。

表1 无组织创新与有组织创新比较

维度	无组织创新	有组织创新
目标导向	以“技术产出”为核心,缺乏明确的市场需求对接	以“经济和社会价值实现”为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需求相匹配
资源配置	分散化、自发式运作,易出现“重复投入”或“资源短缺”	集中化、专业性配置,由专门组织协调跨主体资源
流程管理	无标准化流程,依赖个体经验推进,各创新环节间易断裂	精准化流程,专业团队辅助推进,各环节贯通

2.2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比较研究

作为摆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困境的重要模式,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特征紧密围绕现有转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展开,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转化模式的特征(表2)。

从核心逻辑来看,传统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先有成果、后找市场”的线性逻辑,其价值导向以学术价值为主,科研评价体系重论文轻成果转化,易出现成果与市场的错配。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呈现“需求定义科研、科研对接产业”的闭环逻辑。追求学术价值与产业价值双统一,有助于改变传统的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脱节等现状,促进高校的源头创新成果顺利从“书架”走向“货架”[4]。

从组织主体来看,传统科技成果转化通常没有明确的主体,由科研人员自主进行转化。在成果导向和学术锦标赛制泛化的科研环境下,容易导致价值错位、制度缺位、技术断层与主体分散等困境[5];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强调在行政力量统筹下,整合平衡市场和科研等多元力量,并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表2 传统科技成果转化与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对比

维度	传统科技成果转化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核心逻辑	“先有成果、后找市场”的线性逻辑，以学术价值为主	“需求定义科研、科研对接产业”的闭环逻辑，学术与产业价值统一
组织主体	无明确主体，自主转化，碎片化组织	以行政力量为主，整合市场和科研多元力量，市场化运作
转化流程	断点式，各环节单兵作战	全链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
资源配置	资源孤岛，独立归属	资源共享，数智匹配
专业支撑	无专职团队，非标准化，分散运作	专业团队和专门载体建设，系统统筹

从转化流程来看，传统科技成果转化往往呈现“断点式”流程特征，单兵作战，各环节独立脱节。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呈现从源头创新、概念验证、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到产业加速的“全链条”流程特征，各环节无缝衔接，有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从资源配置来看，传统科技成果转化资源通常独立归属于不同主体，缺乏有效的资源对接共享机制，形成“资源孤岛”，导致科技成果陷入资金死亡谷和达尔文之海等困境，从而无法跨越从新设想到商业化的鸿沟。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强调运用数智技术手段，系统整合技术、资金、市场、政策、人才等资源要素，建立良好的公共资源共享与协同机制[23]。

从专业支撑来看，传统科技成果转化是分散运作模式，大多数无专职团队支持，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以国家大学科技园等专业载体和技术转移转化人员等专业团队为依托进行系统统筹，从根本上摆脱成果转化所面临的困境。

2.3 系统要素与边界组织视角下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三螺旋理论和有组织创新理论逻辑，启发学者从系统性视角深入理解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框架。具体而言，在系统性视角下，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根据创新体系的特点和规律，协调好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使体系达到最优的目标。对于具有复杂性、整体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来讲，也自然需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以更有效率地组织、调动不同的要素来实现既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在要素视角下，科研创新活动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结构性系统[2]。由于创新要素通常在时空分布上处于非均衡且分离的状态，需要对系统内部的各类要素进行整体布局和优化组合。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已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有组织”的系统设计和要素联动机制形成成果转化的合力。例如，陈刚[4]提出推动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其中强调多措并举构建成果转移转化创新生态，打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汇聚教育科技人才等优质资源和创新要素，提升源头创新能力。然而，作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广泛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这类专业载体组织被边缘化，是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理论研究缺陷。

基于上述讨论，进一步将“边界组织”引入对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阐释中，从边界组织的视角探讨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系统要素的整合。边界组织是一种起源于科学社会学的组织类型，在解决跨界域问题中具有独特优势。1999年，Guston[24]正式提出边界组织的概念，以往研究多聚焦在分析科学与政治界域关系，近年来逐渐用于讨论科学与市场界域关系。例如，许可等[25-26]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作为科学与市场间的边界组织角色，及其所具备的半公益性、稳定性、融合性、中立性与专业性等显著特征，并进一步探讨科学、市场、政府等不同界域主导型的机构实践。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是跨越科学与市场界域的复杂活动，在链接多主体、整合多要素的过程中，各类边界组织是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其承担“资源整合、信息传递、要素联动、利益协调”等核心功能，破解转化系统中各方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分歧”等问题，重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力量。

3 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力量建构：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

3.1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现实背景

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的重要阵地、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平台，更是衔接科学研究与产业市场的关键边界组织，天然承担着资源整合、信息传递、要素联动、利益协调的核心功能，是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链接高校、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的重要枢纽。21世纪初，科技部、教育部颁布《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试行办法》，2024年初，国家大学科技园转由教育部牵头管理，国家大学科技园正在迎来新时期的发展契机。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建立139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其服务功能正在进

一步具象化。依托边界组织的独特优势,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能够有效破解传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多元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分歧等跨界域难题,成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力量建构的关键载体。

当前,部分国家大学科技园尚未充分发挥边界组织的核心作用,面临“功能单一(重空间租赁、轻转化服务等)、资源分散(与高校科研脱节、与企业需求错位等)、机制僵化(利益分配滞后、激励不足)”等现实问题,其作为边界组织的资源链接,跨界协调能力不足,导致产业需求与高校教学科研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不够健全,供需双方的信息壁垒未能有效打破,难以充分承载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功能。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开启,旨在针对高校转化短板进行“系统性升级”,实现从“基础空间载体”到“专业边界组织”的转型。

3.2 以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

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优化重塑,成为基于高校资源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者,打造集“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以顶尖人才、科研成果和技术力量为源头,通过提供物理空间、资本对接、产业服务和政策支持,最终实现人才、技术、资本与产业的高水平循环。

第一,重塑“功能定位”:从“空间载体”到“主阵地平台”,强化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统筹能力”。传统大学科技园多以“提供办公空间、收取租金”为核心功能,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性”支撑不足;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大学科技园响应高校科技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承担高校成果转化难题破解的重要使命。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主平台和主阵地,完成从“被动服务”到“主动组织”的转变,承担主动策划成果培育、对接产业需求、支持精准孵化等组织功能,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第二,重塑“资源链接”:从“单向对接”到“双向融合”,强化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效能”。传统大学科技园的资源链接多为“单向”,难以形成“协同合力”;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构建“双向融合”的资源链接机制,与学校、学院、学科和地方平台等不同层次创新节点建立紧密、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整合高校科研资源、企业产业、政府政策、金融资本等资源,能够从源头实现“科研有组织、成果能转化”,避免有组织成果转化各环节的断裂。通过有组织地构建项目网络、服务网络、投融资网络、人才网络、载体网络,吸引更多顶尖人才、优秀项目和战略资本汇聚,推动创新要素在高校、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主体间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这种协同效能的释放,不仅能避免有组织成果转化中各环节断裂问题,更能让国家大学科技园成为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聚合器”。

第三,重塑“运营机制”:从“行政化管理”到“市场化驱动”,强化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支撑”。传统大学科技园多依赖高校行政化管理,决策流程烦琐、激励机制缺位,难以适配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极大制约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动性与效率;作为衔接科学与市场的关键边界组织,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推进运营机制重塑,构建起适配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驱动体系。一方面提供硬赋能支撑,如打造市场化导向的产学研融合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公共技术平台、联合研发平台与场景创新平台,开放共享大型设备等公共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完善软服务体系,如强化专业科创服务队伍,创新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超额激励机制激活人才动力。打造从概念验证、科创投资到产业投资的全生命周期赋能体系,建立概念验证资金基金池,稳步推动概念验证项目产业化,并探索服务换股权和专利作价入股等特色做法,实现服务和投资收入占比稳步提升。既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周期、市场化服务支撑,也有效提升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自我造血发展能力。

4 结论与讨论

围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逐步从“有组织科研”的研究范畴中延伸出来,成为推动高校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摆脱科技成果转化困境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构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具体而言,首先,分析从有组织科研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演进脉络,明确有组织科研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高校科研范式革命的重要意义,及其聚焦高校科研创新而忽视成果转化落地的不足。作为对国家“有组织科研”战略的深化与延伸,进一步阐释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探索与研究现状。然后,开

展了科技成果转化与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对比分析，从三螺旋理论和有组织创新理论视角剖析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地，以边界组织理论为分析视角，结合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实践场景，深入探究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力量建构路径。

本文的研究具有较为深远的理论与现实贡献。一方面，为丰富和完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梳理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提出脉络、研究内涵、特征比较、理论逻辑等，延伸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的理论边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外延，从而弥补现有文献中对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探讨的不足，并丰富对边界组织在科学与市场界域视角下的研究发现。另一方面，为推动高校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供了实践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有组织的视角出发，打破对于成果转化自发探索的局限性认知，为破解高校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时强化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建构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关键载体作用，推动其优化重塑，为各地依托大学科技园推进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 武圣博，杨沁杰，曹聪. 有组织科研——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J]. 科学学研究，2025，43(12)：2513-2523.

[2] 罗志敏，李子龙，胡燕娜. 有组织科研与大学的建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46(2)：119-128.

[3] 黄思维，黄涛，张胜. 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基于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案例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4，44(3)：125-134.

[4] 陈刚. 提升高校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生态构建与模式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2025(10)：18-23.

[5] 黄巨臣，萧然. 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碎片化困境与突破路径[J]. 科学学研究，2024，42(10)：2122-2129.

[6] 王彦雷.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高校有组织科研范式革命[J]. 高校教育管理，2024，18(3)：34-43.

[7] 彭术连，肖国芳.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逻辑、困境与进路[J]. 科学管理研究，2024，42(3)：26-34.

[8] 赵立雨，朱白雪，高冬祺. 高校有组织科研：内涵、难点堵点与化解对策[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16)：150-160.

[9] 姚建建，赵颖萱. 高校有组织科研：核心要素及有效模式[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6)：122-130.

[10] 刘继安，郑润廷，徐艳茹. 理解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整合性框架——基于边界、主体、职能互动关系的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2025(4)：53-62.

[11] 黄亚婷，刘子涵. 何以跨界融合：美国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创新机制[J]. 比较教育研究，2024，46(10)：52-63.

[12] 荆洲，王明，杨启光. 迈向高维度共生：美国国家有组织科研的实践与启示——以未来产业研究所为例[J]. 科学管理研究，2024，42(6)：137-146.

[13] 苏洋，赵文华. 科研何以“有组织”——基于美国七所顶尖高校的案例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2025，47(4)：32-42.

[14] 曲柳凝，石雪怡，杨颉. 迈向有组织的科研形态——日本“学术研究大型计划”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45(6)：62-71.

[15] 王思遥，黄亚婷. 日本研究型大学的有组织科研模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12(2)：20-29.

[16] 石雪怡，杨颉. 英国如何通过改革科研资助评价赋能高校有组织科研——以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2024(12)：63-69.

[17] 赵昕，杜琳宸，李姝姝. 使命导向下的有组织科研——以李政道研究所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2024 (11)：38-49.

[18] 浙江大学科技园有组织成果转化研究课题组. 以大学科技园为载体，加快推进有组织成果转化[J]. 公共政策参考，2023(12)：1-8.

[19] 童嘉，任其龙，胡淳. 高校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 创新科技，2024，24(4)：22-30.

[20] 姚卫浩. 北京大学：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有组织转化[J]. 旗帜，2023(8)：56-57.

[21] LEYDESDORFF L. The triple helix：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innovations [J]. Research Policy，2000，29(2)：243-255.

[22] CURALL S C，FRAUENHEIM E，PERRY S J. Organized innovation：a blueprint for renewing America’s prosperity [M]. NEW YORK：Oxford Uiversity Press，2014.

[23] 褚如辉，吴雪，付自政. 创新孵化载体与龙头企业合作模式探索——以顺丰智慧物流创新中心为例[J]. 中国科技产业，2024(9)：43-47.

[24] GUSTON D H. Stabiliz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US politics and science：the role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s a boundary organization[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9，29(1)：87-111.

[25] 许可，刘海波，肖冰. 基于边界组织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新范式[J]. 科学学研究，2019，37(7)：1231-1237.

[26] 许可，张亚峰，肖冰. 科学与市场间的边界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21(6)：64-73.

Org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dvances

QI Chengshuang[1,2], CHU Ruhui[2], CHEN Tianyue[2], QIU Xin[2], XUE Qingya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Development Co., Ltd., Hangzhou 310007, China)

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org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ssue for leveraging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new nationwide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ddressing the disorganized predica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chievements. Vi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org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as constructed, elaborated on it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cademic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compar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further delved into the capacity-building path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beard for enriching and refin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org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improving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ganize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